

# 帝國與殖民：

## 1934年《臺中市史》與《山口縣史》兩書之書寫比較

郭佳玲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中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 摘要

明治後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的這段期間，日本國內興起一股以在地人研究在地史的鄉土志教育研究運動，即改變以往由國家本位編纂的觀點，轉為由地方為主體的編纂方法。此舉不僅直接影響了日本國內的方志纂修，亦間接地影響了殖民地臺灣的方志纂修。

始自1930年代初期，位處於日本殖民地臺灣的臺中市與日本國內的山口縣不約而同地均展開「市史」與「縣史」的纂修工程，並同時於昭和9年（1934）出版梓行。本文藉由該年出版的《臺中市史》與《山口縣史》兩部書作比較探討，得知此二部書雖然在形式上是以「史」命名，但實質上不脫志書的纂修形式。其次，由纂修內容可看出，當時的臺中市與山口縣雖然同屬日本政府的治理之下，但《臺中市史》的纂修受臺灣總督府政策的影響十分明顯，即是在有利於殖民政府統治的基礎上，殖民地政治的取向濃厚；而《山口縣史》的纂修則是與當時日本國內的社會風氣有關，目的在激發出民眾的鄉土情懷。

經本研究，得知雖然《臺中市史》的纂修亦有受到當時日本國內鄉土志教育研究運動風潮的影響，但在日本官方政治力的介入之下，造成《臺中市史》在編纂上不似《山口縣史》是以激發人民的鄉土情懷，以及提升人民向上精神為目的。因此纂修目的不同，可說是在日本治理下位於殖民地的臺灣與殖民母國日本在志書纂修上最大的差異。

關鍵詞：地方志、地方史、《臺中市史》、《山口縣史》

## 壹、前言

臺灣的地方史志纂修，因清領時期沿襲中國修史志傳統，在方志纂修上已有相當成果。清代臺灣纂修的方志可分成府志、縣志、廳志三種，其中，府志計有6種，縣志計有9種，廳志計有3種。此外，臺灣在建省後為纂修《臺灣通志》，編纂有采訪冊數種，以做為基本史料，內容多為田野調查所得，計有13種。一般而言，采訪冊內容多因各地域風土民情的不同而各有差異，且因為各地域在編成采訪冊後即上呈通志局，故均未刊行佈世。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為治理臺灣之需要亦曾編纂多部地方史志。其中，在大正9年（1920）修改地方行政區劃，將臺灣行政區域劃分為五州（臺北市、新竹州、臺中州、臺南州、高雄州）二廳（臺東廳、花蓮港廳），並改行州廳郡市街庄制。此舉對地方史志的纂修產生重要的影響，即自該制施行後，始出現「市史」的纂修形式，並將編纂層級擴展到街庄役場，擴大了臺灣地方史志纂修的範圍。

日本的地方史志纂修，主要是在1868年明治維新以前，由於官方大力推動，不斷有模仿中國地方志的纂修工作；明治維新以後，除了仍然延續上述的中國史志纂修傳統外，因受到西方史學文化影響，開始出現在志書纂修中加入衛生、司法，或是土木等專題。特別是明治後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的這段期間，由於日本國內興起一股以在地人研究在地歷史的鄉土志教育研究運動，不僅影響了日本國內的方志纂修，亦影響了殖民地臺灣的地方史志纂修。

1930年代，位處於日本殖民地臺灣的臺中市與日本國內的山口縣不約而同地均展開「市史」與「縣史」的纂修工程，並同時於昭和9年（1934）出版。為期能瞭解明治時期臺日地方史志在纂修上有何異同，故本文是以同時於1934年出版的《臺中市史》與《山口縣史》為研究主軸，探討此二部書的纂修綱目與內容，以及纂修者的異同；論述位屬在同一政權下，但在不

同政治環境中，日本對於地方史志的纂修方式，基於統治的概念，是否有本國與殖民地的差異性，以及其編纂內容是否受到本國或殖民地的政治、經濟，甚至是社會因素的影響而有所差別。

## 貳、1945年以前日本地方史志的纂修

自古以來，處在中華文化圈的範疇下，日本積極吸收中華文化，自舒明天皇2年（630）開始，為推動日本社會制度的革新與發展，先後派出大批的「遣唐使」至中國唐朝學習典章制度等，並藉著「遣唐使」往返中國，將各種中國文化與藝術傳入日本，使中國文化成為日本文化的基礎。其中，在中國東傳日本的文化中，地方志書的搜集與編纂，亦成為其仿效的重點，故日本自奈良時代（710～794）開始，朝廷即從事關於歷史與地理的《古事記》與《日本書紀》的國史編纂；各諸侯國亦根據朝廷的命令，開始從事模仿以隋唐圖經和中國地方志書為典範的地方志書纂修工作，以作為朝廷施政的依據，並編纂成為上呈天皇的「風土記」。

和銅6年（713）5月，元明天皇向各諸侯提出要在郡鄉的地名上加上由兩個漢字組合成的好名；並收錄郡內物產的種類、土地肥沃的狀態、山川原野名字的由來，以及古老舊聞的傳說，由各諸侯國以公文書的形式呈報朝廷。<sup>1</sup>另外，自平安時代（794～1185）到鎌倉時代（1185～1333）間，雖沒有編纂地方志的紀錄，但曾有許多書籍引用各諸侯國風土記的逸文記事，雖然數量不多，頗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江戶時代（1603～1867），受到鎖國政策影響，「唐船」<sup>2</sup>舶來的各種物品成了日本人接觸中國文化的重要管道，其中包括多種中國各地編纂的地方志書，引發日人收集與編纂方志書籍

1 犬井正，〈關東地方の誌史類における「誌」と「史」に関する若干の考察〉，收入齊藤博、來新夏主編，《日中地方史誌の比較研究》（東京：學文社，1995年），頁168－172。

2 日本江戶時代稱中國船為「唐船」。

的興趣；<sup>3</sup>另一方面，亦由於長期的安定世局，日本國內各地交通順暢，地理知識便為一般民眾所渴求；復以文人學者對於古代風土記的散逸感到可惜，乃奮起恢復舊業。因而幕府及各藩均開展了編纂地方志的風氣，其內容多為土地狀況、地名、物產、歷史、人物、名勝古蹟、寺社，以及習俗等項目，以呈文的形式編集而成。

明治天皇時期（1868～1912），中央政府為了有效確立郡縣制的施行，乃視修史為國家事業的一部份，故由國家著手規劃一系列地方志的編纂。其不但重視編修國史，亦相當重視地方史的編纂。明治5年（1872）9月，依據太政官布告第288號令調查各府縣的町村實態，正式展開官撰地方志即《皇國地誌》的纂修工作。然而，其後受到推進編纂事業政治力的不足、歷史記述的不完整、因國家統計事業的發達而導致削減地方志在行政上的價值，以及缺乏統一的編輯計畫等因素，導致《皇國地誌》的纂修於明治26年（1893）正式結束。<sup>4</sup>基本上，由於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在地方行政制度上採取廢藩置縣的措施，導致地方志的名稱漸漸變成都、道、府、縣史，以及市史，內容因而也逐漸傾向地方史的形式。特別是明治後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為了加強人民對生長環境、勞動樣態的瞭解，以加深對地域文化的理解，日本國內興起一股以在地人研究在地史的鄉土志研究教育運動，即改變以往由明治初期國家本位編纂的觀點，而是轉而以地方為主體的編纂方法。由於此運動是屬於一種在東洋意識下編纂具有半官半民色彩的鄉土志，其內容包含了名勝古蹟的訪尋，彰顯英雄豪傑、孝子節婦，或是描述風土和自然環境的概況等，並自該地域的固有社會系統或是傳統文化特色著眼，呈現出其生活、勞動，以及從事各種活動的人民樣態，以加深住民對各自地域文化的理解。<sup>5</sup>因而更加促進了地方史編纂事業的進行，各地編纂出

3 大庭修著，戚印平、王勇、王寶平譯，《江戶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中國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253 - 308。

4 石田龍次郎，〈皇國地誌の編纂〉，《社會學研究》，8（1966年3月），頁37 - 44。

5 齊藤博，〈市史づくりの問題点〉，收入地方史研究協議會編，《地方史の新視点》（東京：雄山閣，1988年），頁120 - 121。

版的方志亦多轉為以「史」為名，在纂修上重視史料的搜集、記載與解讀，在內容上亦傾向由在地人呈現地方事物的記載方式，自以往著重橫向記述的地方志方式轉為縱向歷史記述的地方史為主，具有濃厚的史書撰寫色彩，但仍不失地方志書性質。

### 參、兩部書史的纂修緣起與規劃

#### 一、《臺中市史》

臺中市舊稱大墩街，清康熙44年（1705）張國入墾犁頭店，是漢人入墾臺中的開始；清雍正10年（1732），因官方在犁頭店設置巡檢署以便於治理，使得聚居於此地區的人口快速增加，始出現「大墩街」街名。清領時期臺中市曾先後隸屬諸羅縣、彰化縣管轄，且因已成為商業興盛之地，故在清道光11年（1831）周璽纂修的《彰化縣志》中已見記載；清光緒13年（1887）臺灣建省後，臺中市因而隸屬臺灣縣管轄。清光緒18年（1892）時，臺灣省設「臺灣通志總局」於臺北，各廳縣故亦設採訪局採集志料，時臺灣縣亦曾奉命設局採訪史料，並編有《臺灣揀東上堡採訪冊》、《臺灣縣採訪冊》等書，為臺中縣修志先聲，惜今市面上皆無傳本流通。<sup>6</sup>

日明治28年（1895）日本領有臺灣之後，為了便於統治，曾在臺灣推行以臺灣人民生活習慣與地理環境為調查重心的慣習調查資料冊、地方實況調查書、地方志，以及類似地方志書籍的編纂工作，保守的估計約可分七類，分別是：第一類是州、廳、市概況，如《臺北州要覽》等有29種。第二類是郡要覽，如《七星郡要覽》等有47種。第三類是縣志，如《臺南縣

6 根據臺灣學者鍾淑敏與林麗華的研究指出，《臺灣揀東上堡採訪冊》藏於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臺灣縣採訪冊》部份殘稿藏於文史工作者陳炎正住所。鍾淑敏、林麗華，〈（昭和）臺中市史〉，收入曹永和、王世慶總纂，吳文星、高志彬主編，《臺灣文獻書目解題（第一種方志類四）》（臺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87年），頁117-118。



誌》等有3種。第四類是街庄部份，如《士林街要覽》等有74種。第五類是雜誌，如《基隆港大觀》等有12種。第六類是風土記，如《澎湖風土記》等有2種。第七類是鄉土誌，如《樹林鄉土誌》等有11種。上述七類包含有承續清修志遺緒仿中國方志體例編纂者（如《新竹廳志》），有因慣習調查而編纂者（如《臺南縣誌》），有記載地方實況的調查書（如《臺北市十年誌》），亦有為鄉土教育之需要而編纂者（如《嘉義鄉土概況》）。除了部份雜記與風土記的編纂是立基於瞭解臺灣的舊有制度與風俗，以制定統治方針外，大部份編纂的「概況」、「要覽」、「縣志」，或是「街庄志」等，在其綱目中多可看到有行政、軍事、警察、治安、衛生等項目的配置，可知仍是強調記載日本領臺後的政績及社會進步實況，以彰顯其在殖民地治理之各類成效，故無不站在統治者的立場進行編纂。

日治時期官撰地方志依行政層級，可分為全臺史志、縣廳志、郡市史志，以及街庄志四種，尤以郡市史志的纂修最為詳盡。總計在官撰郡市史志方面，有《苑裡志》、《樹杞林志》、《臺北市十年誌》、《臺中市史》、《高雄市制十周年略志》、《嘉義市制五周年紀念誌》，以及《臺北市政二十年史》等志書的編纂。一般而言，官修的郡市史志多屬紀念性質，如《臺北市十年誌》是為了紀念臺北市成立十週年而編纂、《高雄市制十周年略志》則為紀念高雄設市十週年而編纂。不過，《臺中市史》的編纂則是起因臺中地區缺乏系統性的記載，昭和2年（1927）臺中市尹（市長）遠藤所六到任後，有鑑於臺中市為日本帝國南方鎖鑰臺灣中部之新興都市，其在政治、教育、產業、經濟，以及交通等方面，均佔有相當重要的位置，但歷來記載有關臺中市發展與變遷的史料卻甚為缺乏，僅存有一些施政相關紀錄或舊慣調查研究報告。因此，遠藤所六為探尋臺中市之歷史發展與沿革，以作為治理與將來建設大臺中市的藍圖，因而有纂修一部完整的《臺中市史》以資後人參考與運用的想法。<sup>7</sup>此外，再加上當時日本國內興起一股以在地人

7 曾根原弘，〈臺中市史・緒言〉，收入氏平要等編，《臺中市史》（臺北市：成文出版社，1985年，影印1934年原刊本）。

纂修在地史的鄉土志纂修風潮，而此一風潮又是以市町村史的纂修為基礎，受此風潮逐漸傳至臺灣的影響下，臺中市的各級學校也有開始編纂臺中市鄉土志的構想，並積極從事相關田野調查資料的採集，亦間接為《臺中市史》的纂修提供了珍貴基本史料。

臺中市尹遠藤所六為了能夠落實編纂《臺中市史》的想法，乃於昭和2年（1927）6月，召集臺中市的各級學校教員與地方人士，於臺中市役所召開《臺中市史》編纂會議，以商討市史編纂事宜；並在官方的支持下，組織成立「臺中市史編纂委員會」負責市史的纂修。該次會議中除了委託臺中師範學校教師氏平要擔任編纂主任委員外，並聘任市內各級學校教員與地方人士21人為編纂委員，正式展開《臺中市史》的纂修工作。其後，歷經召開6次編纂會議的討論，並邀請臺灣總督府編纂囑託（顧問）尾崎秀真提出臺中市發展之關鍵與編纂市史的要點後，終於商討出市史的編纂期程與調查項目以作為纂修準則，即第一年為蒐集資料、第二年為摘錄與整理資料，以及第三年為編纂作業的實行（如釐訂綱目），並以昭和5年（1930）為內容纂修下限。<sup>8</sup>在蒐集資料方面，除了官方（廳、州、市）持續出版的施政概況外（如《臺中廳管內概要》、《臺中州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臺中市管內概況》等書），主要是以臺中州公共團體之紀錄、鄉土調查、舊書、口碑、傳說，以及報紙相關資料為中心。

昭和3年（1928）遠藤所六調任臺南市尹，由屏東郡長小島仁三郎繼任臺中市尹；小島仁三郎就任臺中市尹後，除繼續推動《臺中市史》的編纂事業外，並於昭和4年（1929）聘任原田芳之為編輯，專職處理編纂事務，正式展開《臺中市史》的內容編纂工程。原田芳之到任後，曾探討臺中住民之移住路線，除提出臺中的平埔族群的遷移方向係由東部移住中部、荷蘭人由南部向北部發展、漢人由西部移往中部開墾，以及日本人是由北部向中部移民的論點外；並以空間、時間與人物等角度，自各方面探討臺中市發展的

8 〈教育事項〉，《臺中市報》，第52號，1927年6月24日，頁72；原田芳之，〈臺中市史編史後感〉，《臺灣時報》，昭和7年6月號，1932年6月，頁104。



因素，進而架構出其所謂的臺中中心主義。此外，原田氏初至臺中時，有感於自身對臺中市並不熟悉，因此到任後即曾數次走訪與臺中市發展有密切關係的鹿港、王田、彰化、大肚、梧棲，以及豐原等10餘處，採集與臺中市有關的資料，以期完善市史編纂內容，終於在昭和6年（1931）完成《臺中市史》的初稿。<sup>9</sup>總計全書分成七編二十六章一百一十節，詳載臺中市的沿革、天然地理、氣象、建置、官治、軍事、司法、警察、教育、衛生、土木行政、交通、勸業、財務行政、人口、風俗習慣、救濟、風俗、宗教、傳說，以及遺蹟。

《臺中市史》初稿完成後，為求文稿記載內容的精實無誤，自昭和6年（1931）至昭和7年（1932）間，市史編纂委員會除委託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囑託（顧問）猪口安喜對志書文稿內容進行校閱訂正與刪補內容外，亦將文稿送請臺中市內各官衙、學校、公司，以及銀行等單位進行再次的查證與校閱，最後再呈請相關單位覆閱，終於在昭和9年（1934）曾根原弘擔任市尹時完成編纂工程，由臺灣新聞社以鉛字排印本的方式出版發行。<sup>10</sup>總計《臺中市史》的編纂時間自昭和4年（1929）開始，至昭和9年（1934）出版為止，共費時6年7個月，前後歷經五任臺中市尹，為日治時期臺中市惟一纂修完成的官方志書。

## 二、《山口縣史》

山口縣的歷史可追溯到平安與鎌倉時期（794～1333）時，由於地方武士集團的逐漸壯大，大內氏與厚東氏分別在周防國與長門國確立了穩固的統治地位。室町時期（1338～1573），由於大內弘世平定了周防、長門兩國，並通過與中國和朝鮮的貿易積累財富與吸收大陸文化，曾創造出燦爛的大內文化。然而，大內氏的統治到大內義隆時期，因被家臣陶晴賢討伐而衰落，之後毛利元就擊敗陶氏，掌握此地的控制權，周防、長門兩國因而成

9 原田芳之，〈臺中市史編史後感〉，頁107 - 108。

10 民國74年（1985）臺北市成文出版社據臺灣新聞社排印本影印，以16開本精裝二冊的方式，編入「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247號。

為毛利氏的領地。其後，江戶幕府時期（1603～1867），因毛利氏的後代藩主毛利輝元將藩廳設在萩城，所以又可稱其為「毛利藩」或「萩藩」；幕府末期，由於毛利藩的本藩與支藩關係惡化，毛利敬親因而將其藩廳自萩城移至周防山口的山口城，因而又稱其為「周防山口藩」。<sup>11</sup>明治元年（1868），在以毛利氏為主的各地大名（諸侯）實行大政奉還政策之下，江戶幕府時代宣告結束，政權回歸明治天皇，日本正式步入近現代時期。明治天皇並於明治4年（1871）施行全國廢藩設縣制度，使得都、道、府、縣成為日本的最高行政單位，在此政策施行下，此區域因多山地而改名為山口縣。<sup>12</sup>

山口縣建縣以後，為了沿續舊藩時代的修史事業，開始出現了由學者近藤芳樹與近藤清石等人陸續主導了縣內的修史事業，如明治20年（1887）編纂有《周防長門地誌提要案》，以及《山口縣史料》；明治38年（1905）編纂有《山口縣風土誌》外，另外亦有針對山口縣的舊支藩編纂的《豐浦藩記》、《德山藩記》，以及《岩國藩記》等書。<sup>13</sup>其後在昭和4年（1929）山口縣更成立了「防長史談會」，並發行機關志《防長史學》，為山口縣留下許多珍貴的史料。<sup>14</sup>

1930年代，日本為了慶祝「王政復古」<sup>15</sup>七十年，全國各自治體上自都道府縣，下至市町村多有從事各自治體史的編纂工程，如《埼玉縣史》、《石川縣史》等；因此，昭和9年（1934）時，山口縣為了配合慶祝紀念王政復古七十年的活動，以及全面且系統性地闡述山口縣的歷史發展，並以之作為國家政治的根源與縣政府施政措施的參考，因而有山口縣史編纂所的成

11 日本習慣上將萩藩和周防山口藩時代的毛利氏統稱為「長州藩」。

12 山口縣在明治4年（1871）4月廢藩置縣後至1871年11月第一次府縣統合之前，曾短暫劃分成岩國縣、山口縣、清末縣，以及豐浦縣四縣。

13 岩根保重、佐佐木義行等撰，《山口縣文化史》，通史篇（山口縣：山口縣廳，1963年增補發行），頁685 - 687。

14 岩根保重、佐佐木義行等撰，《山口縣文化史》，通史篇，頁692。

15 所謂「王政復古」指的是1867年時，江戶幕府末代將軍德川慶喜實行大政奉還，將政權還於明治天皇，結束了日本長達二百多年的幕府統治時期。

立，負責《山口縣史》的編纂工程。山口縣史編纂所成立後，因有鑑於歷來山口縣的歷史多著眼於幕末維新時毛利藩推動王政復古、大政奉還等事的撰寫；相對而言，對於山口縣近世以前的歷史敘述則較為疏略，缺乏深入的記載。為了期盼加深民眾對山口縣整體歷史的瞭解，因此於昭和9年（1934）時，由大橋良造擔任為編輯，負責《山口縣史》的纂修，主要以山口縣的民政史為編纂主軸，並以田野調查的方式徵集縣內相關史料，希冀重建與還原山口縣過去的歷史發展。<sup>16</sup>

《山口縣史》共分成上、下兩卷，每卷前面均列有「凡例」，說明該卷編纂的主軸與編寫方式。其中，上卷的凡例主要是在註明志書的編纂體例與篇目結構、記載內容精細的標準，以及採集資料的選擇與運用，並說明上卷的撰寫是採用橫分門類、豎寫發展的記事方式，系統性地展開山口縣最初的縣史編纂事業；下卷的凡例則在說明人物列傳的入傳標準，以及記載方式。總計全書共分成五編十五章一百一十項，記載山口縣的歷史沿革、地理形勢、民政發展、社會概況、宗教信仰，以及人物傳記等。其後，《山口縣史》的編纂期程受到日本逐漸進入戰時體制的影響，因此在全國皆處於戰備狀態的情形下，編纂時間不到一年即由山口縣史編纂所使用鉛字排印本方式出版刊行，為二次大戰結束前山口縣惟一編纂的縣史。

## 肆、兩部書史的體例與內容

### 一、體例

「體例」，是指著作的編寫格式或文章的組織形式。地方志的體例是地方志的表現形式，所謂形式表達內容，內容決定形式，可說體例是與志書的內容相依存。自志書編纂的內容來看，狹義的志書體例只是指其體裁和凡

---

16 大橋良造，〈序〉，收入大橋良造編，《山口縣史》（廣島縣：山口縣史編纂所，1934年）。

例，即編纂的體式和方法；但自廣義的觀點來看，則是指纂修宗旨、類型、名稱、年代斷限、體裁、框架和篇目、大事記，以及人物立傳等項目，即幾乎包括所有志書編纂所需的元素。<sup>17</sup>由於志書的體例與撰寫方式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確定志書的編纂體例實為方志纂修工程中最為重要之事。

1895年日本領臺後，臺灣總督府為了調查臺灣各地的風俗、習慣，以及制度等，鼓勵地方修志，以作為施政參考。由於臺灣總督府在臺灣的志書纂修上，主要是以中國傳統修志體例的基礎，融合西方社會科學式的書籍編纂體裁，故在纂修方法，較強調科學的調查研究。即以中國傳統方志的「書志體」為主，增加經濟、氣象、人口、財政、交通、衛生等類目，並強調新增科學的調查研究。<sup>18</sup>故《臺中市史》在編纂體例方面，雖然仍是以傳統編、章、節的編纂方式，將全書共分成七編、二十六章，以及一百一十節，之後再按其內容分門別類，可稱其為「綱目體」（亦可稱「分志體」），但在內容的條列已有別於傳統中國的條列方式。綜觀其目錄所列，可知其雖將全書分成總說、統治機關、財務行政、民族、社會事業、神社及宗教，以及口碑傳說遺蹟七編，但在類目中已增加了經濟、氣象、財政，或是產業等屬於西方史書編纂時會運用的類目；且其在章下各節的體例，則有採分志體分項記述者，以及採章節體按時敘述者。因此，臺灣學者高志彬曾提出《臺中市史》的編纂是採用歷史著述之析論，門下繫以子目，猶如「分志體」之型式，然其內容與方法已與清代所修之志書大異其趣，擺脫了傳統志書的綱目體裁，屬於一種新式的「史志體」志書。<sup>19</sup>

《臺中市史》綱目之擬定主要是依據昭和2年（1927）2月召開的「臺中市史編纂委員會」會議決議，該次編纂委員會主要是就市史內容的調查

17 王良行，〈鄉鎮志體例另論〉，收入許雪姬、林玉茹主編，《「五十年來臺灣方志成果評估與未來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9年），頁298 - 299。

18 陳靜寬，〈兩部《臺中市史》有關日治時期記載之比較研究〉，《臺灣文獻》，第54卷1期（2003年3月），頁186 - 187。

19 高志彬，〈臺灣方志之纂修及其體例流變述略〉，《臺灣文獻》，第49卷3期（1998年9月），頁196 - 198。



事項作分配，指出在自然地理方面，必須包括位置與範圍、地質與地形，以及氣象、氣候、暴風、地震；在臺中發達總說方面，必須包括臺中市建設以前的歷史梗概、臺中市建設的動機、臺中市建設的狀況、臺中市建設後的發展變遷，以及臺中市的現況；在臺中市的發展細說方面，則必須包括行政、司法、軍事、警察、教育、衛生、土木建築、交通郵政、產業經濟、財政金融、社會事業、民族人口、人情風俗，以及宗教神社。<sup>20</sup>其中，「總說」下的「臺中的天然地理」與「氣象」即原訂之「自然地理」；「臺中建置」與「臺中發達的概觀」則為原訂之「臺中發達總說」；其餘者則由「臺中發達細說」歸納分編而成。<sup>21</sup>

另一方面，有關日本國內的《山口縣史》編纂體例，依目錄的編排方式，可知其雖分成上、下兩卷，但由於各卷亦是以編、章、節的編寫方式作為編纂主體，編下列章，章下有節，其下再依內容分有細目，因此在體例上亦屬於「綱目體」的纂修方式。《山口縣史·上卷》主要是記載山口縣的現況與歷史演變，可析分出三編，第一編為記載縣勢概要、縣重要職員、歷代國守及守護職守護代、大內氏史實概觀、毛利氏史實概觀，以及防長近世史；第二編為記載舊長藩及他藩志士殉難者、史蹟名勝，以及縣內各市的市勢總覽；第三編則為神社、寺院，以及各神道信仰的分類記述。

依《山口縣史》中所列之編章節綱目來分析，可知其在內容上有關山口縣的「縣勢概要」記載，雖然是採用傳統地方志編纂以類繫事的編排方式，但由其分成沿革、土地、氣象、人口、交通、產業、教育、財政、社會事業、衛生等項目來看，實際上已與傳統志書的類目有別，運用了西方的科學方法與分類來編目。在記載到山口縣的歷史發展時，主要是以時間的縱向劃分方式，先分期後分類，按照年代順序以時繫事，說明了山口縣在中世、近世，以及幕末維新時期的歷史發展概況。因此若以臺灣學者高志彬的志書

20 原田芳之，〈臺中市史編史後感〉，頁105。

21 鍾淑敏、林麗華，〈（昭和）臺中市史〉，收入曹永和、王世慶總纂，吳文星、高志彬主編，〈臺灣文獻書目解題（第一種方志類四）〉，頁120。



體例分類標準來看，也可以說《山口縣史》是屬於「史志體」的纂修型式。至於《山口縣史》的「下卷」，則全為山口縣人物史事的記載，全卷悉依入傳者的居住地區分成「縣內人物史」與「縣外在住者人物史」二編，編之下不再分節，而是直接以政治、教育、實業等職業別分設項目，主要記錄對山口縣有特殊貢獻，或是出身山口縣，但在縣外有傑出表現的人物事蹟，目的在藉由記錄這些活躍於各領域，且成為模範的現代人物事蹟，使民眾能以其為榜樣激發出奮發向上的精神。總計《山口縣史》的內容共分成五編十五章一百一十項，其記載內容包含山口縣的歷史沿革、地理形勢、民政發展、社會概況、宗教信仰，以及人物傳記等部份。由於《山口縣史》在體例方面受到明治後期鄉土志教育運動的影響，導致其在編纂上帶有以歷史縱向脈絡為書寫方式的地方史色彩。

一般而言，史書與志書的不同之處在於編寫方式與記載內容的安排與範圍。在地方志編纂過程中，方志體例主要是用來貫徹修志宗旨，以突顯出志書特色的表現形式，所謂「史體縱看、志體橫看」，便說明了志書具有獨特的橫排門類，以類繫事之特徵，因此修志之道，必須先嚴體例。<sup>22</sup>因此，就體例方面而言，「地方志」的撰寫方式主要是以門類為主，著重以調查的方式橫向記述當代某一特定區域中事物的現狀、大事記、疆域，以及沿革等；「地方史」的撰寫方式則是依靠史料，並以時間為經，空間為緯，縱向敘述一地的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發展特點與規律。<sup>23</sup>且一般說來，編纂地方史的工作可以由史學工作者擔負起來，但地方志的編纂則除了歷史學者外，更需要有經濟、社會，以及文學工作者等多方面的通力合作，因此需要的人力也較編纂地方史多。

縱觀並分析《臺中市史》與《山口縣史》兩部書的卷志佈局（表1），可發現此兩部書雖然均是以「史」作為書名，但若就其體例方面來探討，可

22 （清）章學誠，〈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二書〉，收入《章氏遺書》（臺北市：漢聲出版社，1973年景印劉刻本卷15），頁311。

23 彭靜中，《中國方志簡史》（中國四川：四川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18。

發現兩者實是屬於綱目體的志書編纂體例方式，也就是先將全書分成若干門類，於各門類之下再設細目，至於其類目和層次的多寡，則視內容編排而定。至於，此兩部志書雖然在編纂體例上，仍屬於是在傳統志書的纂修形態上加入西方的科學分類方式，但其之所以皆不以「志」而改使用「史」作為書名，推測應是受到甲午戰爭後日本國民意識的高漲，以及國內鄉土志教育研究運動興盛有關，即注重以在地人民的角度從事地方鄉土志書的編纂工作，俾便民眾可以知曉自己生活的土地之歷史發展與現況。

有關日本地方志書的纂修方式由志體走向史體之轉變，日本學者齊藤博指出此一轉變是起自明治時期的鄉土志教育研究運動，逐漸演變成地方史的學術研究，乃至於地方經濟史與地域社會史相關之研究。<sup>24</sup>日本學者犬井正亦曾指出，大約自明治時期開始，日本各地方自治體開始依各自獨特之歷史發展編寫史志類相關書籍，這些書籍與其說是為了提供行政資料，不如說是為了使市民瞭解自己土地而具備啟蒙書特色；再者，由於受中國方志影響的日本地方志敘述方式一旦定型後，容易流於呆板而僵硬，導致無法迅速建立新地方志構成的方法論，使關於各自治體的地方志關係圖書的刊行逐漸減少，結果以「志」為書名者，多流於百科全書式的條列撰寫方式，無法引起民眾的閱讀興趣。相反地，以「史」作為書名的地方志書，由於其纂修主軸是在敘述人民的各種生活百態，民眾的接受度相對提高。因此，「史」與「志」給人印象的不同，使明治時期以後的史志類書籍在命名時漸漸多用「史」作為書名而不用「志」，儘管二者在體例和內容上無太大差別。<sup>25</sup>

24 齊藤博，〈市史づくりの問題点〉，收入齊藤博、來新夏主編，《日中地方史誌の比較研究》（東京：學文社，1995年），頁153 - 154。

25 犬井正，〈関東地方の誌史類における「誌」と「史」に関する若干の考察〉，收入齊藤博、來新夏主編，《日中地方史誌の比較研究》，頁180 - 181。

表1、《臺中市史》與《山口縣史》綱目表

《臺中市史》綱目	《山口縣史》綱目
第一編 總說	上卷
第一章 臺灣的沿革概要	第一編
第二章 臺中的天然地理	第一章 縣勢概要
第一節 中部臺灣	一、位置並地勢
第二節 臺中廳地理的梗概	二、沿革
第三節 臺中市街地及位置	三、土地
第四節 地形及地質	四、氣象
第三章 氣象	五、人口
第一節 氣候	六、交通及通信
第二節 暴風雨	七、產業
第三節 地震	八、教育
第四章 臺中建置	九、財政
第一節 改隸前的沿革	十、議會
第二節 改隸後的沿革	十一、社會事業
第五章 臺中發達的概觀	十二、社寺
第一節 市街建設前的歷史的梗概	十三、兵事
第二節 領臺前的臺中	十四、警察
第三節 領臺後的臺中	十五、衛生
第二編 統治機關	十六、表彰
第一章 官治	十七、官公吏
第一節 改隸前的行政	第二章 縣重要職員氏名
第二節 軍政時代的行政	一、縣各課主腦
第三節 置縣	二、警察
第四節 廢縣置廳	三、學校
第五節 自治制度的施行	四、市町村
第二章 軍事	第三章 歷代國守並守護職守護代
第一節 衛戍隊	一、周防國守表
第二節 憲兵	二、國守
第三節 臺中衛戍分院	三、長門國守表
第四節 在鄉軍人	四、周防國守護職
第三章 司法	五、長門國守護職
第一節 臺中地方法院及檢察局	第四章 大內氏史實 概觀
第二節 刑務所	一、大內氏基源 陶晴賢的諫言
第四章 警察	二、敕使下向 陶晴賢的謀反
第一節 警察組織的沿革	三、陶口山討入 鰐石川之戰
第二節 警察官區及配置	四、法泉寺之戰 大寧寺之戰
第三節 保安警察	五、義隆的生害 大友三男義多多良家督
第五章 教育	六、賜旨毛利元就討伐陶氏 大內義長
第一節 改隸前的教育	陶全姜攻打津和野吉見正賴
第二節 改隸後的教育制度	七、吉見毛利軍的會合 八木、金山、
第三節 教育機關	佐東、佐西之城皆降
第四節 臺中市教育會	八、折敷畑的合戰 久島合戰
第六章 衛生	九、元就的謀略 嚴島合戰
第一節 出生死亡	

帝國與殖民：1934年《臺中市史》與《山口縣史》兩書之書寫比較

第二節 上水	十、陶全姜自刃 義長隆房退治
第三節 下水	十一、鞍掛落城 德山興元寺內隆房切腹
第四節 污物掃除	十二、長府谷長福寺內義長切腹 大內輝弘山口入
第五節 撒水	十三、糸米峠之戰 輝弘浮野峠內切腹
第六節 飲食物及飲料水	十四、防州山口十境之詩 大內氏御家根本記
第七節 冰	第五章 毛利氏史實概觀
第八節 墓地及火葬場	一、毛利氏略系圖 毛利元就宗家相續
第九節 醫療機關	二、毛利氏與尼子氏決裂歸屬大內氏 毛利元就的戰歷概要
第十節 傳染病預防	三、以吉田為中心與尼子氏之戰 尼子氏從備後路來攻
第十一節 阿片	四、尼子氏從石州路來攻 太郎丸之戰
第七章 土木行政	五、尼子氏本陣移至青山和光井山池之內戰
第一節 市區改正	六、土取場之戰 宮崎之戰
第二節 住宅的體制	七、光井山之戰 藝備兩國的攻略
第三節 電氣事業	八、跟隨大內氏出雲遠征 赤穴城之戰
第四節 水利事業	九、月山城附近之戰 大內軍敗退
第五節 公園	十、大內義長的迎立及吉見正賴的奮起 嚴島戰的筋書
第八章 交通	十一、凱旋式 防長進擊年表
第一節 改隸前的交通	十二、元就防長的進軍 鞍掛合戰
第二節 改隸後的交通	十三、須須萬沼城之戰 沼城終於陷落
第三節 通信	十四、陶氏的滅亡 大內義長的最後
第九章 勸業	十五、元就的山陰經略 溫井城之戰
第一節 原料生產的農業	十六、大森銀山所屬的變遷元就的出雲攻略
第二節 商事會社及組合	十七、白鹿城之攻擊 月山城的攻略
第三節 工業	十八、月山城內的窮迫 義久兄弟來藝州
第四節 金融	十九、尼子氏的再舉 毛利、大友兩氏的和議成立
第十章 臺中測候所	二十、毛利軍的九州出陣 山口的動亂
第一節 緒言	二十一、月山城被攻圍 布部山之戰
第十一章 官公私立醫院	二十二、末次城之戰 元就的卒去
第一節 臺中醫院	二十三、降幸盛 元就的遺訓
第二節 臺中婦人病院	第六章 防長近世史
第三節 市立城北醫院	一、嘉永六年癸丑
第四節 私立醫院	二、安政元年甲寅
第三編 財務行政	三、安政二年乙卯
第一章 稅政	四、安政三年丙辰
第一節 改隸前的稅政	五、安政四年丁巳
第二節 改隸後的稅政	六、安政五年戊午
第二章 臺中市財政	七、安政六年己未
第一節 歲入	
第二節 歲出	
第三章 稅務	
第一節 公課負擔	
第二節 市稅徵收成績	
第三節 戶稅課稅標準生產額	
第四節 市債	
第四編 民族	
第一章 人口	
第二章 風俗習慣	
第一節 改隸當時的狀態	

第二節 風俗習慣的改善	八、萬延元年庚申
第五編 社會事業	九、文久元年辛酉
第一章 保護救濟	十、文久二年壬戌
第一節 財團法人臺中慈惠院	十一、文久三年癸亥
第二節 職業紹介所	十二、元治元年甲子
第三節 無料宿泊所	十三、慶應元年乙丑
第四節 臺中警察署人事相談所	十四、慶應二年丙寅
第五節 臺中市浴場	十五、慶應三年丁卯
第六節 臺中為善團	十六、明治元年戊辰
第七節 方面委員	十七、明治二年己巳
第八節 方面委員事業助成會	十八、明治三年庚午
第九節 乳幼兒保護協會	十九、明治四年辛未
第十節 臺中市公設質舖	第二編
第十一節 行旅病人救護所	第一章 舊長藩並他藩志士殉難者
第十二節 再生舍	一、四境戰爭
第十三節 中尊寺附屬常盤授產部	二、戊辰戰爭
第十四節 私立清信產院	三、北海道役
第二章 風教上の施設	四、脱隊事件常備軍
第一節 國語普及	五、長藩關係殉難他藩志士
第二節 向陽會	第二章 史蹟名勝
第三節 家長會	一、下關市
第四節 婦人各種團體	二、字部市
第五節 青少年團體	三、山口市
第六節 臺中市水泳場	四、萩市
第七節 臺中運動場	五、阿武郡
第九節 幸町庭球場	六、大津郡
第十節 劇場	七、豐浦郡
第十一節 公會堂	八、美禰郡
第十二節 州立圖書館	九、厚狹郡
第十三節 行啟記念館	十、吉敷郡
第十四節 臺中市民館	十一、佐波郡
第十五節 臺中武德殿	十二、都濃郡
第十六節 午報	十三、玖珂郡
第六編 神社及宗教	十四、熊毛郡
第一章 神社及社	十五、大島郡
第一節 縣社臺中神社	第三章 山口市勢概覽
第二節 臺中稻荷社	第四章 下關市勢概覽
第二章 宗教	第五章 宇部市勢概覽
第一節 天理教	第六章 萩市勢概覽
第二節 金光教臺中教會所	第三編
第三節 神道天行居臺中支部	第一章 神社
第四節 基督教	第二章 寺院
第五節 佛教	第三章 各神道
第六節 寺廟	下卷
第七編 口碑傳說遺蹟	第一編 縣內人物史
第一章 口碑傳說遺蹟	一、教育、教育家、法曹家、學校
第一節 口碑傳說	二、醫師、齒科醫、獸醫、藥劑師
第二節 遺跡	



## 帝國與殖民：1934年《臺中市史》與《山口縣史》兩書之書寫比較

第三節	古木	三、名門舊家、自治產業功勞者、軍事功勞者、實業家、會社員
第四節	記念保存	四、自治產業、通信運輸、釀造業
第五節	陸軍合葬墓地	五、機械工業、土木建築業、木材商、被服商、米穀商、食料品商、石炭商、塗裝業
		六、美術家、時計商、樂器商、陶器商、助產師、製藥業、製造工業、茶華師範、
		七、農業、製肥業、畜產業、養雞業、植物商、果實商、園藝業、鹽田業、水產業、漁網商、水乳搾取業、海外成功者
		第二編 縣外在住者人物史

資料來源：氏平要等編，《臺中市史》、大橋良造，《山口縣史》。

## 二、內容

《臺中市史》編纂主旨指出其編纂目的在於使日本國人瞭解位居帝國南方之臺灣中部新興都市臺中市之歷史、地理，以及人文樣貌，以作為政府建設臺中市之參考；而《山口縣史》的編纂主旨亦是指出其編纂目的在於闡述山口縣的歷史發展，以作為國家政治的根源與縣府施政措施的參考，可知此兩部志書之纂修目的皆為作為政府施政之參考。此處試由此二部志書纂修內容中自然環境、人文活動，以及寫作層面三方面探討其異同處。

### （一）自然環境

《臺中市史》在有關自然環境方面的敘述，主要是在介紹臺中的天然地理與氣候變遷。其中，在地形與地質方面，主要說明臺中市的地形是由東大墩丘陵與南臺中丘陵組合而成，其間有旱溪、綠川，以及柳川等多條河川流經，並繪製有臺中市的地形斷面圖與地質斷面圖，而由地質斷面圖的製作，可知臺中市的土質中因帶有粘土成份，曾經使臺中市的窯製業興盛發展。

至於在氣象方面，是將其分成氣候、暴風雨，以及地震三部份來討論。例如在「氣候」部份，是將大正10年～昭和5年（1921～1930）間臺中市的晴雨天數與降雨量的數據拿來與全臺灣的紀錄做比較，指出臺中市因地理位置的影響，使得其相對全臺其他各地在氣候上不僅雨天的天數較少，全年

總雨量亦偏低。在「暴風雨」部份，則是記載自日本領臺以來臺灣受到颱風侵襲的次數、風速，說明自1895年到1918年間，共遭受到四十餘次的颱風侵襲，其中對臺中市產生影響的有27次，但因有中央山脈的阻隔，故多未造成嚴重災情。另外，在「地震」部份，是記錄歷年來臺中市的地震發生次數，指出臺中市在夏季發生地震的頻率較高；並指出臺中市曾遭受三次較大規模的地震襲擊，分別為明治42年（1909）5月23日、明治43年（1910）3月20日，以及大正5年（1916）11月15日。

另一方面，《山口縣史》中對於山口縣的自然環境方面描述，則僅有其位置與地勢、土地，以及氣象三方面的粗略記載。首先，在位置與地勢方面，主要說明山口縣的地理位置及其地勢的走向。其次，在土地方面則是記載山口縣的土地面積與使用情形，指出雖然縣內的土地使用扣除官有地外，在民有地方面可分成水田、旱田、宅地、山林、鹽田、池沼、原野，以及雜種地等不同類型，但因受限於境內多山的地形，山林地佔全縣土地的百分之六十，故在土地利用上，主要是以山林地的利用為主，因而在農業生產上使用了梯田式的集約耕作方式，農產品的種類也較多元。最後，在氣象方面則指出山口縣具有三面環海的地理位置，受到海洋的溫度調節，因此全年氣溫並未呈現劇烈的變化；且多於夏秋之交侵襲日本的颱風，亦因山口縣在地理位置上受蔭於九州與四國各主要山脈的遮蔽，因此受災情形較為輕微，反而是在每年6、7月間由梅雨季帶來的豪大雨，常造成縣內嚴重災情。

基本上，相較於《臺中市史》中對於臺中市的自然環境有較為深入的討論與記載，《山口縣史》中對於山口縣的自然環境之描述，在內容上似乎稍顯不足。但值得注意的是，《山口縣史》中對縣內自然環境之記載是屬於以當時山口縣現況為依據的一個常態性質記錄，而《臺中市史》則雖然亦是將日治時期臺中市的自然環境做一般常態性的記載，但其另外繪製許多的相關統計圖表以資佐證，並且著重於將其以全臺其他各地的自然環境作細部資料的整理與分析，以突顯出臺中市自然環境的特色。筆者認為《臺中市史》之所以對臺中市的自然地理與環境有詳細記載，為史家應有本職的表現，但似

亦不排除與當時日本正為大東亞戰爭作準備，即必須進一步掌握熱帶氣候環境的資訊，而將臺中市作為南進時的前哨基地有關，因此格外重視臺中市的地理環境與氣候水文之變遷記錄，以作為戰爭時的參考依據。

## （二）人文活動

人文活動的記錄，向來是地方志書纂修時的重點，因而不論是《臺中市史》或是《山口縣史》在纂修時，其在有關人文活動的記載亦均佔有相當份量。其中，《臺中市史》中有關人文活動的記載項目包含了臺中市的統治機關、社會事業、風俗習慣、宗教，以及傳說遺蹟等，內容豐富，其中又以政治方面的統治機關介紹占有相當篇幅，表現出強烈的政治色彩。例如在「統治機關」編的「官治」記載中，首述臺灣建省後之行政組織與行政區域，次述日治時期歷任臺中廳知事與臺中市尹任內之大事，並按時間順序陳述其任內的施政建設、民間組織、活動，以及市政情況。

其次，《臺中市史》亦詳細記載臺中市的行政、治安、軍事、自治制度、司法、教育，以及工商業的實施狀況，其主旨不在說明臺中市固有的政治與產業概況，而是著重記述日本領臺後的臺中市內之現代化工、商、金融，或是交通等事業的開展情形，並將其與臺中市在清領時期所修的道路、橋樑、河川、陸運，以及交通機關做一比較，以具體突顯出日治時期臺中市的現代化成果。可知其編纂的著眼點在於強調日本領臺後，因將明治維新以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以及各種現代化制度和設施引進臺灣，使臺灣在各方面得已改變過去自清朝統治時期的陋習，成為現代化的社會。書中更強調臺中市的教育、衛生，以及風俗習慣在日治時期時因官方努力，得以大幅提昇民眾的基本教育程度，以及改善民眾不良的衛生與風俗習慣，並且因日本政府引進西方的醫療衛生觀念與設施，有效降低了臺中市各類傳染病的流行，以及人口的死亡率。

《臺中市史》中有關人文活動的記載方面還包括了神社及宗教，以及口碑傳說遺蹟。其中，有關神社及宗教的記載，主要著重在臺中市的日式神社之參拜與日式宗教的佈教概況記錄，而自清朝開始普遍流行於臺灣民間的中

國宗教信仰與寺廟，因受到日本國家政治力的介入，使臺灣民眾被迫改信日式宗教；加以臺灣總督府施行廢除臺灣傳統寺廟運動的影響，導致市史中有關臺灣傳統宗教的敘述僅佔一小部份，實為刻意的選擇性記載。至於在口碑傳說遺蹟的記載方面，市史中除了分述與砲臺山、柳川、綠川，以及旱溪之口碑傳說外，亦記載了北門樓、湧泉閣，以及臺中舊城牆等與軍事有關之遺蹟，並特別側重記載與日本軍隊有關的記念亭和陸軍合葬墓地，以彰顯出日本軍隊在對抗臺灣人武裝抗日行動時的英勇，其藉由編纂志書達到灌輸閱讀者日本國家意識的目的表露無遺。

另外，較特別的是在《臺中市史》的內容安排中特別設置有「社會事業」編，其除了記載日治時期臺中市的各種保護救濟事業外，更專設有關風俗教化章，專門介紹當時臺中市致力於推動國（日）語教育、矯正風俗，以及社會教化方面的各種半官方團體，如國（日）語夜學會、向陽會、家長會、婦女會、青少年團體，以及各種民間社團。該篇並介紹當時臺中市已建設有具備現代化設施的游泳場、運動場、劇場、圖書館，以提供臺中市民從事各項休閒與藝文活動，企圖以文化教育的手段，消滅臺灣人之傳統中國文化意識，以達到同化之目的。此舉顯示出日本當局欲藉由突顯臺中市社會教化的成效，彰顯其對於改善臺中市舊有風俗習慣所做的努力，以及如何以現代化的設施和觀念，給予臺中市民進步的觀念。其次，由市史內容中亦可看出，日本人在施行保護救濟事業與風俗教化上的改革時，皆是以政府力量組織各種社會團體，可說在相當程度上展示出政府主導公眾事業的政治力與執行力。

從上述《臺中市史》有關臺中市人文活動方面的記載，可以發現其纂修目的實為宣揚臺灣總督府如何對臺灣社會環境進行現代化的改造。例如書中強調臺中市在日本的治理下，不僅在生活上力圖廢除傳統中國封建遺制，並在工商金融業上驅逐外人商權，採用新設市場、金融機構、農會、商會，目的在使日本商社可以取得最大的經濟利益；在人口與交通上，即是著重進行戶口與土地清查，鋪路造橋、建設電信電話系統等。特別是書中記載臺



中市設立的各級新式學校，以彰顯其普及教育的成效，增加臺中市的教育機能，尤其是以日語為統一國語，以便民眾吸收西洋近代文明科學知識等，在彰顯臺中市推行現代化的成效。

另一方面，《山口縣史》中對山口縣內人文活動方面的描述，主要是在縣勢概要中記載昭和5～9年（1930～1934）山口縣施行縣勢調查後的土地、氣象、人口、議會、交通、通信、產業發展、教育、衛生，以及社會事業等情形。例如在議會方面，即記載山口縣在昭和8年（1933）時在貴族院、眾議院、縣會、市會，及町村會的議員人數；或是記載縣內的重要職員姓名，如縣知事、市町村長、政府行政人員、各級學校校長等。按此方式除了可以替縣內保留許多人事行政資料外，並可藉由纂修過程中縣政資料的提供與整理來還原出山口縣的民政發展史。此外，縣史中以縱向敘述的方式說明山口縣的歷史發展，即大篇幅地以中世時期大內氏的治理山口縣為開端，其後記載近世時期毛利氏在山口的治理過程，最後以逐年的條列方式呈現山口縣在江戶幕府時期的近世史記載。雖然該部份的行文方式仍採取平鋪直述的方式，但卻特別地在目錄上標明各時期的重要人物或戰役，以突顯該段內容的焦點，並輔以章回小說式的撰寫筆法，使整體內容除了學術性外，亦富有較高趣味性，容易吸引讀者目光。

《山口縣史》亦分別記述山口縣內的名勝古蹟，以及山口縣內的宗教信仰。其中名勝古蹟是以山口縣內各市郡的著名古蹟為主，包含日本內務省指定的天然紀念物與歷史建築等，以顯示縣內豐富的地理景觀與人文色彩；以大量著名的神社佛閣為中心，記載其設立原由、宗派、祭神，以及住持姓名，有助於縣民對縣內宗教信仰演變的瞭解，並特別著重在日式宗教方面。關於宗教信仰方面的記載，縣史中收錄的宗教主要是以日本的神道教為主，其次為佛教，至於一般民間信仰與基督信仰則較少數。因此，可看出此時日本神道教已成為日本民間普遍信仰，至於由中國傳來的佛教雖然在當時也已轉變成日本式的佛教，但其功用仍與神佛合流之神道教有所不同；而基督教的傳佈在當時仍有其一定的侷限性，故流傳範圍不廣，民間主要仍是以神道



教的信仰為中心，因此縣史中特別將山口縣內各級寺社的歷史與祭典作介紹。

由上述《山口縣史》中記載人文活動方面的內容來看，可知其除了記錄當時山口縣的縣勢發展、名勝古蹟，以及宗教傳佈現況外，全書在內容上實際是較偏重於山口縣歷史發展軌跡的敘述，以及說明縣勢消長的原因。尤其特別關注於近世江戶幕府與幕末維新兩時期毛利氏的記載，其目的實為在突顯山口縣具有推動日本現代化過程的搖籃地位。

### （三）寫作形式

臺灣自明治28年（1895）割讓給日本後，經過臺灣總督府實施無方針主義、內地延長主義，以及皇民化運動的政策後，島內之政治、經濟、社會，或是教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已受到日本國內情勢之影響。當日本國內在明治天皇以降，興起以特定地域為對象的研究風氣時，由政府主導全國各地進行「皇國地誌」的編輯，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各地市町村及郡有鄉土史編纂事業。然而，此時的鄉土史編纂內容較傾向整理已散逸之各藩國歷史，以及人物傳記，其目的無非是在彰顯藩主功績與稱讚特定人物。特別是明治後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的這段期間，日本國內興起以在地人研究在地史的鄉土志教育研究運動時，不僅影響日本國內的地方志纂修，亦影響殖民地臺灣的地方志纂修事業。<sup>26</sup>

#### 1、《臺中市史》

昭和9年（1934）出版的《臺中市史》在內容上除了強調臺灣總督府領臺後的政績外，並著重在突顯臺中市實施現代化成果的記載。就寫作形式而言，《臺中市史》是採取分門別類的敘述方式，著重日本領臺以來對臺中市進行一連串政治、經濟等措施的成效記載，但實質上仍兼有修史事業的實

26 明治天皇後期展開的地方志書纂修，其編纂多帶有慶祝或記念性質，而此種具慶祝或記念性質的地方志書，在大正與昭和年間興起的郡市史志纂修風潮中又更加明顯，例如慶祝大正天皇即位大典、明治百年，以及郡制廢置等，多成為各地方自治體編修地方志書的重要契機。其中，大正時期興起的市史或郡志編纂，多是使用活用文獻，以經濟生活、與民俗等分類敘述；昭和時期的「鄉土史」則是在郡市史志的編纂基礎上，將重點放在自己生長土地歷史的研究。

用性。因此，曾有學者認為《臺中市史》的「臺中建置」與「臺中發達之概觀」兩單元，是屬於施政記錄性質，為日治時期其他志書纂修所未見，實為該書的特色。<sup>27</sup>至於，在內容的敘述脈絡上，《臺中市史》是以「略古詳今」的方式為著眼點，目的除了在突顯出臺中市現代化方面的具體成效外，主要是在表現出地方志書編纂時應具備的時代性與地方性。

然而，從《臺中市史》記載的臺中市之制度、教育、衛生、殖產、勸業、通信、人情，以及風俗的內容進一步探討時，可發現其書中所載錄之臺中市的人文現象，其實是一個以日本人社會為主體的生活樣貌，即為以臺灣總督府的角度來編纂，內容中看不到臺中市原本社會的實際樣貌，也就是以一種日本人為中心的論述，建構出日本人眼中的臺中市。例如，市史內容中闡述日本人致力於改善臺中市的風俗習慣或教育制度時，只記載屬於官方體系的御用團體之貢獻，卻刻意忽略臺中市亦是當時臺灣著名詩社——「櫟社」的集會中心，對於臺中市民的文化向上亦有相當貢獻。<sup>28</sup>當昭和9年（1934）出版的《山口縣史》，對於山口縣內大大小小神社的描述是如此鉅細彌遺時，《臺中市史》中有關宗教信仰方面，則亦是以日本式的宗教與神社為記載中心，甚至是在敘述佛教信仰時，亦是以日式佛教的傳播記述為重心，全書中更是不曾見到臺灣民間宗教（如道教）的記載。此外，書中亦刻意忽略大量臺灣傳統寺廟在臺中市的紀錄，僅保留一些較具代表性的寺廟，如樂成宮與萬春宮。此種記載方式容易讓人誤以為臺灣人民信仰的宗教亦是以日本式的神道教為中心，可知其在市史中採取選擇性的記載方式，以及有意識地忽視臺灣傳統社會中早已普遍存在的宗教信仰，企圖在文化上影響臺灣人民意識型態的意圖十分明顯。

27 鍾淑敏、林麗華，〈（昭和）臺中市史〉，收入曹永和、王世慶總纂，吳文星、高志彬主編，前揭《臺灣文獻書目解題（第一種方志類四）》，頁120。

28 日治時期臺灣詩社林立，其中最具規模與影響力的有臺北「瀛社」、臺中「櫟社」、臺南「南社」，三者被合稱為「臺灣三大詩社」。三者中以櫟社成立最早，在三大詩社中最具批判性格與抗議精神，由臺灣中部的古典詩人所組成，除了以霧峰林家做為活動中心外，在臺中市亦有集會所「瑾園」（臺中州臺中市花園町5之9）。見廖振富，〈櫟社〉（2009年10月28日），收入行政院文化部，「臺灣大百科全書」：<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4539>（2013年3月15日點閱）。

《臺中市史》中所呈現的臺中市，不僅是一個具現代化建設的都市，且是一個不論在政治、經濟、文化，或是教育水準方面均已到達相當水準的臺中市。但是，臺中市民的生活環境若是真如市史中記載的那樣進步與繁榮，則為何在當時臺籍人士的文學作品中呈現出的臺中市民生活，仍是處於一個受到種種壓迫的樣貌，例如現代化帶給臺灣人民的不是優渥的生活環境，而是勞力的被榨取，以及工資的被剝削。<sup>29</sup>若進一步探討市史編纂形式後面所具有的意識型態，可清楚發現日本殖民者是如何以現代化的外包裝來掩飾其剝削臺灣人民的痕跡，顯示出日本官方實是在戰略體制的考量下對臺中市進行一連串現代化建設。誠如時任臺中州知事的竹下豐次在市史序言中所記，臺灣雖為一蕞爾小島，但實為帝國南方之要地，以及帝國向南發展的堡壘，並且為確保東亞和平之鎖鑰，日本實負有維護亞洲大陸和平之責任；而欲知臺灣的真實面貌，則必須透過史志的記載不可，此即為《臺中市史》編纂目的所在。<sup>30</sup>

## 2、《山口縣史》

《山口縣史》在寫作形式上，為期使閱讀者能溫故知新，故多著重在山口縣置縣以前歷史發展過程之記載，即不論是在章節編排或是在撰述內容上，多採用「詳古略今」的原則。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山口縣史》是以民政方面的記載為主，因此在有關山口縣的早期歷史記載，除了在第一編「縣勢概要」之第一章與第二章中，對山口縣的土地、人口、產業、財政，以及教育等現況方面，有較為詳細的敘述外，自第四章歷史發展方面開始，即對具有重要位置的中世，以及近世時期史實概觀的敘述上，則多所著墨，由於其處理方式為以一些代表性的戰爭發展為記載脈絡，而非自經濟或社會發展層面去重建史實，故僅能看出當時的政治發展演變，無法看出山口縣在社會、經濟，甚至是藝文活動方面的現況或發展情形。再者，此種收錄原則與編纂

29 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學家楊逵曾著有多篇文章，描述臺灣人民受到日本官方壓迫的生活實態，知名文章有〈送報伙〉、〈鵝媽媽出嫁〉、〈田園小景〉等。

30 竹下豐次，〈臺中市史·序〉，收入氏平要等編，《臺中市史》。

方向，亦導致其在「第二編」與「第三編」的纂修內容上，自然偏重在與戰爭有關之史蹟名勝的記載。正如該書編纂者大橋良造在「緒言」裡所說，此部縣史的編纂主要是以提供縣政資料為主，希望能完善山口縣民政資料的不足，以做為日後政府施政參考。<sup>31</sup>

歷來有關山口縣的記述，多是以《防長史談》等通俗性史料為主，不僅較缺少民政方面的記載，對於史實的收錄亦不盡完善。但該部縣史的編纂除了著重於山口縣之文獻整理與收錄，以淺顯易懂的文字敘述加速閱讀者對山口縣歷史與現況的理解外，亦偏重於縣政裡有關民政資料的記載與提供，以提供縣政資料為主，作為山口縣施政的參考，故其在編纂上內容上實是多著重在民政方面的記載，較未能全面性的記載山口縣在政治、社會或經濟上的發展狀況。<sup>32</sup>但藉由書中記載山口縣各時期的社會內部階層分解、村內行政人員和貧農的對立等問題，或是萩藩的文教政策與地方文藝興盛之關係等內容，亦可知其仍試圖以記載地方性的社會發展狀態，勾勒出日本整體的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生活樣貌；<sup>33</sup>而縣史中對於山口縣內各市郡的史蹟名勝，以及各市郡之重要町勢概要與著名神社佛閣，更是多所記載。因此，藉由《山口縣史》的記載，可使人清楚瞭解山口縣的過去與現在，除了瞭解山口縣的民政發展外，亦可大致掌握縣內各地域的地理位置與各項施政概況，為初識山口縣者提供了一部清楚且詳實的歷史書、地理書，或可稱為百科全書的參考資料。

值得一提的是，《臺中市史》與《山口縣史》在寫作形式上有一明顯分別點，即在於對人物事蹟的記載。傳統志書纂修中，通常存在有對此地域內有特殊貢獻的人物立傳之原則，因而《山口縣史》中對縣內有貢獻的人物，如政治家、教育家、實業家、木材商、水產業者、製肥業者，甚至是助

31 大橋良造，〈緒言〉，收入大橋良造編輯，《山口縣史》，上卷。

32 郭佳玲，〈近代日本地方史志的纂修：以新修《山口縣史》為例〉，《臺北文獻》，第175期（2011年3月），頁208～210。

33 藩制史料研究會，〈地方史のあり方について〉，《山口縣地方史研究》，第5號（1961年6月），頁33。



產師、公司職員等，不論其身份或職業貴賤，只要是對山口縣有特殊貢獻者，均鉅細彌遺的將之事蹟入傳，並盡可能地附上入傳者的照片，以及傳主的居住地。其目的主要是希望藉由這些入傳者事蹟的記載，為山口縣民樹立榜樣，以使其成為縣民學習的對象。然而，在同一時期，位屬於日本統治下臺灣，在從事《臺中市史》的編纂時，卻未設有人物傳記的項目。筆者推測此應是由於日治時期由日本官方或民間印製的人物傳記相當豐富，如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與等人物傳記計有10餘種；且市史編載的主要目的，誠如遠藤所六所言，是為了要作為治理與將來建設大臺中市的藍圖，以資後人參考與運用。<sup>34</sup>故似無需要在市史中編列「人物」專項。

由上述分析可知，若自寫作形式的角度來探討《臺中市史》與《山口縣史》兩部志書，可知日本在編纂地方志書時，其對於在日本國內與殖民地臺灣之志書纂修方式，實隱含著不同的政治意識型態。也就是說，雖然同屬日本政府領導下編纂而成的地方志，位處殖民地的臺中市，其市史的纂修主要是在為日本的殖民統治作宣傳，因此其寫作形式中處處顯現日本意識型態，對於日治以前的臺中市歷史發展著墨不多，而是將編纂重點放在日本統治下的臺中市現況；而反觀《山口縣史》的纂修，卻是在當時日本國內盛行在地人纂修在地史的風潮下，相當忠實地反映出山口縣的政治社會現況與歷史樣貌。由此可知，雖然同屬日本政權下，其在志書纂修方面實有殖民地與非殖民地的差異。

### 伍、兩部書史的編纂者比較

《臺中市史》在編纂者方面，主要是採取由主政者（即市尹）倡議，並組成編輯委員會，之後由編輯委員會的委員擔任執筆者之形式纂修。就編

---

34 曾根原弘，〈臺中市史・緒言〉，收入氏平要等編，《臺中市史》。



纂者的人數與身份而言，據統計，先後參與《臺中市史》編纂的市尹、助役、纂修委員、編輯者，以及校閱者共47人之中，除了臺中公學校訓導謝宗賢、臺中女子公學校訓導邱雲艷，以及臺中師範學校囑託（顧問）黃腹三人為臺籍人士外，其他均為日本籍的官員與教育工作者，其中又以小公學校之校長與訓導佔纂修人員的大多數，明顯得知《臺中市史》纂修人員的組成在國籍方面，實是以日本官方與日本教育者為主要纂修成員，實際握有志書的編寫權，而臺籍人士雖也有參與市史的纂修工作，但因人數僅有三名，縱使其對市史纂修內容有不同意見時，亦無法發揮實質作用，只是扮演點綴裝飾的角色。（表2）

自《臺中市史》的倡修者與協助者，到市史的編纂者，甚至是編輯與校閱者，其成員多為政府官員與學校的教育工作者，其中臺籍人士僅有三人，且其身份亦只為公學校或師範學校的訓導或囑託，並未具有實質上的撰寫權，可知編纂市史的目的，並不是要讓編纂者展現他的見解，而是具有呈現政績與為官方建立檔案與史料的意義。因此代表著《臺中市史》在纂修過程中，不論是編輯權，或是書寫權其實均是掌握在日本官方與日本教育者手中。也就是說，我們若將《臺中市史》的內容與當時臺籍作家的作品相比較後，可發現《臺中市史》中記載的那個具備高度現代化建設臺中市，說穿了其實只是日本人眼中的臺中市，是臺中市役所宣傳下的臺中市，因為書中並未呈現出在現代化建設背後中的臺中市民，特別是臺灣人民的實際生活樣貌。可說此一志書的纂修目的其實是在宣揚日本人如何帶領臺灣人民進入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以及日本政府如何改善臺灣人民的生活環境與品質，欲藉由市史的編纂來彰顯其治理的苦心與功勞，要臺灣人民對其心存感激。因而從市史編纂的內容中，處處可以看到日本官方誇示其對臺中市實行現代化建設與新式教育的成果。

表2、《臺中市史》編纂關係者

編纂關係	人名	職務
	遠藤所六	臺中市尹
	小島仁三郎	臺中市尹
	名和仁一	臺中市尹
	古澤勝之	臺中市尹
	曾根原弘	臺中市尹
	園部薰	臺中市助役
	古澤勝之	臺中市助役
	河野十郎	臺中市助役
	宗藤大陸	臺中市助役
	福田看	臺中市助役
	拔井光三	臺中市助役
委員	氏平要	臺中師範學校教諭
	高濱利久	臺中師範學校教諭
	野末誠一	臺中師範學校教諭
	田村勉	臺灣公立公學校訓導
	木下莊太郎	赤十字社書記
	田中米藏	臺中第一尋常小學校校長
	安倍英喜	臺中州公立小學校校長
	財津吉隆	臺中第一尋常高等小學校訓導
	洲濱文太郎	臺中第二尋常高等小學校校長
	荒木三郎	臺中第二尋常高等小學校訓導
	大山正名	臺中第二尋常高等小學校教育心得
	杉本主二	臺中公學校校長
	小野一郎	臺中公學校訓導
	肥後杉雄	臺中公學校教員心得
	長井實一	臺中女子公學校校長
	小川滋	臺中女子公學校訓導
	中島勝利	臺中女子公學校訓導
	吉田作太郎	曙公學校校長

帝國與殖民：1934年《臺中市史》與《山口縣史》兩書之書寫比較

	加藤虎太郎	曙公學校訓導
	赤木虎雄	曙公學校訓導
	高澤三平	臺中市社會書記
	石垣孫保	臺中第一尋常高等小學校訓導
	本島信重	臺中第二尋常高等小學校訓導
	謝宗賢	臺中公學校訓導
	西川政藏	臺中女子公學校訓導
	內田賢吉	臺中女子公學校訓導
	邱雲艷	臺中女子公學校訓導
	黃腹	臺中師範學校囑託
	角田哲雄	臺中公學校訓導
	渡邊壽昌	樹子腳公學校校長
	星萬壽雄	臺中市視學；昭和6年任臺灣公立公學校訓導
	北橋千代作	臺中市社會書記
編輯者	原田芳之	臺灣公立小學校訓導
	丸尾秀夫	臺中市統計主任
校閱者	星萬壽雄	臺中市視學；昭和6年任臺灣公立公學校訓導
	中袴田熊吉	臺中市視學兼臺中市屬；昭和7年補臺中州公立公學校訓導兼臺中州公立公學校校長
	大岩榮吾	臺中師範學校校長
	宗藤大陸	臺中市助役
	名和仁一	臺中市尹
	猪口安喜	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囑託

資料來源：〈教育事項〉，《臺中市報》，第119號（昭和3年5月3日），頁54；〈教育事項〉，《臺中市報》，第52號（昭和2年（1927）6月24日），頁72；原田芳之，〈臺中市史編史後感〉，頁104；〈辭令〉，《臺北州報》，第9號（大正9年10月9日），頁22。

其次，就編纂人數與編纂時間而言，《臺中市史》的編纂自遠藤所六市尹於昭和2年（1927）倡議修纂開始，到昭和9年（1934）曾根原弘擔任市尹時纂修完成，期間共歷經五任臺中市尹，花費6年7個月的時間，編纂關係者先後總計達47人。其花費之時間長久，以及參與人員之多皆為日治時

期臺灣其他地區纂修之地方志所無法比擬，因而不論是在質或量上皆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另一方面，有關《山口縣史》的編纂者成員身份與人數，以及纂修時間，依據現存資料所知，其主要是由山口縣史編纂所的大橋良造負責主持編纂工作，因此是屬於採用不設編輯委員會，直接聘請或任命執筆者的纂修形式；在纂修時間上，依目前所得資料，知其花費時間不到一年而成書。雖然目前受限於此一成立於二戰前的山口縣史編纂所相關資料多已散失，導致無法確切得知當時縣史編纂所的組織沿革與縣史編纂的規模大小，以及實際參與縣史編纂的人數。<sup>35</sup>然而，有鑑於地方志書的編纂工程均十分浩大，多耗費相當的人力與物力，故可推測當時《山口縣史》在編纂時，應亦具有相當規模，特別是其實際纂修時間又甚為短促，因此亦可推知當時參與縣史編纂者的人員應不在少數，且纂修的成員應為與山口縣有深厚地緣關係者，或是長期對山口縣歷史有研究者，否則要如何在僅有數個月的纂修時間中，單憑少數人力，一方面要對山口縣的現況作調查，另一方面又要從事縣史的編纂工作，故若非有相當的人力配置，要在短時間內完成縣史的編纂實為不易之事。

再者，就《山口縣史》記載的內容而言，書中除了描述山口縣的自然環境與人文活動外，亦十分注重記錄當時山口縣的縣勢發展現況，尤其著重於有關民政方面的資料記錄；此外，書中對於山口縣的歷史發展沿革與背景之探討亦多所著墨，可說此種纂修方式實是順應當時盛行的鄉土志教育研究運動風潮，以激發民眾的鄉土意識為目的。雖然《山口縣史》的編纂時間不到一年，但由其纂修方式與內容來看，實是採用以在地人編纂在地史的方式，以喚醒人民對自己生長與居住土地的關懷。

---

35 有關山口縣史編纂所的規模，以及縣史編纂人員的名單，由於目前所存的史料記載不多，因此筆者曾訪問成立於戰後的山口縣史編纂室與相關人員，但該編纂室人員卻表示對於戰前曾有過的縣史編纂事業不甚熟悉，且亦無相關資料留存下來，因此無法得知當時縣史編纂所的實際情況，只知該部縣史應為民間人士所倡修，其組成之山口縣史編纂所亦應較具有民間色彩。

## 陸、結論

地方志因為可作為國家的施政參考依據，並且具有資政、存史，以及教化的功用，因此歷來不管是中國、日本或是臺灣的主政者均極重視地方志書的纂修。值得注意的是，在專制體制的國家與政權中，為了配合國家政策的宣揚，以及政令的實行，方志的纂修內容就往往會因為國家政治權力的介入或是有心人士的刻意影響而有所偏倚，導致其應該具有的社會功能也亦隨著纂修者的意識型態與目的而隨之改變。

本文藉由同時於昭和9年（1934）出版的《臺中市史》與《山口縣史》兩部書作一比較探討，得知日本政府因為在日本國內與殖民地臺灣採取不同的政治治理模式，進而導致有不同的地方史志書籍纂修方式，故顯現在地方史志的纂修內容上實大不相同。即當時臺灣在日本統治之下，臺灣總督府雖也曾對臺灣行各種深入且廣泛的基礎調查，但其皆導因於殖民統治之需要；且雖然有基礎調查，但卻未有大規模與全面性的文獻搜集、整理，以及修志工作，亦未完成專門的纂修史志機關。《臺中市史》的編纂方式與內容，可知在殖民地臺灣，臺灣總督府所注重的是政令宣導與政績宣揚，因而表現在纂修地方史志書籍上是偏重有關民政方面的資料記載，也就是希望運用市史的編纂來闡明其對臺中市施行現代化的成效，以證明其統治權利的穩固和優良政績，因此在綱目編排，特別在「統治機關」篇列有「警察」、「衛生」項目，在「社會事業」篇列有「保護救濟」、「風教施設」等項目。再者，由於《臺中市史》的編寫權與審查權皆是由日本官方與一些高級士紳所掌控，即是以在地的日本人纂修臺中在地的歷史，故在內容上相當誇示日本人對臺中市的各項現代化建設與社會措施，並刻意忽視臺中市在日治時期以前的各項建設成果，以及一般臺中市民實際生活情況。因此，嚴格來說，《臺中市史》中所記錄的臺中市只能說是日本人眼中的臺中市，而非臺灣人實際生活中的臺中市，其纂修市史的出發點與觀點，皆導致整部市史具有相當濃



厚的殖民地政治色彩。

另一方面，在《山口縣史》的纂修上，則可看到地方史志書籍的編纂容易受到當時社會風氣的影響，亦即縣史編纂當時，日本國內以在地人纂修在地史的風氣已相當成熟，呈現在《山口縣史》的內容，亦是以山口縣的歷史沿革與現況發展為主軸。在內容分配上誠如縣史的編纂者大橋良造所言，主要是以提供縣政資料為主，希望能完善民政資料的不足，以做為日後施政的參考，因此對於山口縣的社會與經濟發展的敘述略顯不足，但對山口縣的歷史發展敘述仍相當詳細。再者，《山口縣史》的編纂過程中，因受到日本國內以在地人研究在地史的鄉土志研究運動風潮影響，故政治力量介入志書編纂的色彩亦較薄弱，因此展現在縣史內容中時，是鉅細彌遺地記載與介紹山口縣內的人文與歷史發展，除了對縣勢概況有詳細說明外，並描述縣內各地著名歷史建築與名勝古蹟的由來，各方面均顯示出其記述方式都是以喚醒山口縣民的鄉土情懷為目的，不似同時期殖民地臺灣的《臺中市史》編纂是以政治目的為取向。

本文將昭和9年（1934）的《臺中市史》與《山口縣史》作比較後，除了可發現當時的地方史志書籍纂修形式雖然受到明治時期鄉土志教育研究運動，以及西方進步史學思潮的影響，導致其由志書性質走向史書的性質，但就此二部書而言，雖然在形式上是以「史」命名，但實質上仍為志書的纂修形式。其次，由此二部書的纂修內容可看出，當時的臺中市與山口縣雖然同屬日本政府的治理之下，但在史志書籍纂修上卻有著不同的意義，即《臺中市史》的纂修受臺灣總督府政策的影響十分明顯，殖民地政治的取向濃厚；而《山口縣史》的纂修則是與社會風氣有關，目的在激發出民眾的鄉土情懷。雖然《臺中市史》的纂修在日本官方政治力的介入之下，亦有受到日本國內鄉土志教育研究運動風潮的影響，但在編纂上不似《山口縣史》是以激發人民的鄉土情懷，以及提升人民向上精神為目的。因此纂修目的不同，可說是殖民地臺灣與殖民母國日本在史志書籍纂修上最大的差異。

## 引用書目

- 《臺北州報》，第9號，1920年10月9日。
- 《臺中市報》，第52號，1927年6月24日。
- 《臺中市報》，第119號，1928年5月3日。
- 王良行，〈鄉鎮志體例另論〉，收入許雪姬、林玉茹主編，《「五十年來臺灣方志成果評估與未來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9年，頁295 - 310。
- 犬井正，〈關東地方の誌史類における「誌」と「史」に関する若干の考察〉，收入齊藤博、來新夏主編，《日中地方史誌の比較研究》。東京：學文社，1995。
- 石田龍次郎，〈皇国地誌の編纂〉，《社会学研究》，8（1966年3月），頁1 - 62。
- 高志彬，〈臺灣方志之纂修及其體例流變述略〉，《臺灣文獻》，第49卷3期（1998年9月），頁187 - 205。
- 原田芳之，〈臺中市史編史後感〉，《臺灣時報》，昭和7年6月號，1932年6月。
- 陳靜寬，〈兩部《臺中市史》有關日治時期記載之比較研究〉，《臺灣文獻》，第54卷1期（2003年3月），頁183 - 224。
- 郭佳玲，〈近代日本地方史志的纂修：以新修《山口縣史》為例〉，《臺北文獻》第175期（2011年3月），頁203 - 224。
- 曾根原弘，〈臺中市史・緒言〉，收入氏平要等編，《臺中市史》。臺北市：成文出版社，1985年，影印1934年原刊本。
- 鍾淑敏、林麗華，〈（昭和）臺中市史〉，收入曹永和、王世慶總纂，吳文星、高志彬主編，《臺灣文獻書目解題（第一種方志類四）》。臺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87年。

藩制史料研究會，〈地方史のあり方について〉，《山口縣地方史研究》第5號（1961年6月），頁6 - 12。

（清）章學誠，〈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二書〉，收入《章氏遺書》。臺北市：漢聲出版社，1973年景印劉刻本卷15。

大橋良造，《山口縣史》。廣島縣：山口縣史編纂所，1934年。

大庭修著，戚印平、王勇、王寶平譯，《江戸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中國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

岩根保重、佐佐木義行等撰，《山口縣文化史》通史篇。山口縣：山口縣廳增補發行，1963年。

地方史研究協議會編，《地方史の新視点》。東京：雄山閣，1988年。

彭靜中，《中國方志簡史》。中國四川：四川大學出版社，1990年。

齊藤博、來新夏主編，《日中地方史誌の比較研究》。東京：學文社，1995年。

廖振富，〈櫟社〉（2009年10月28日），收入行政院文化部，「臺灣大百科全書」：<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4539>（2013年3月15日點閱）。

Empire and Colonization :  
A comparison over chronicle writing of Taichung City and Yamaguchi  
Prefecture in 1934

Kuo Chia-Ling<sup>\*</sup>

Abstract

A movement of editing and writing local chronicles has emerged in Japan during the time between the post-Meiji Restoration era and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movement resulted in a shift of Japanese historians' focus of editing local chronicle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central government to the priority of local awareness. The shift has also influenced historians in Taiwan, where was then a colony of the Japanese empire, with regard to the method the latter remembered the island's history.

In 1930s, historians in Taichung, central Taiwan, launched the project to write a chronicle for Taichung City and Taichung County. The time was almost the same as a group of Japanese historians in Yamaguchi Prefecture engaged in a similar plan. The two groups, moreover, coincidentally published their works in 1934. The coincidence gave rise to my attention, especially that whether the two chronicles share any similarity given the historical ties between Japan and Taiwan.

My study finds that the chronicles edited by historians of the two places in the same time shared certain similarity. The works, however, also 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Despite both being named the "History" of the two administrative districts, the two publications were, in fact, compiled and finished more likely following the method of "chronicle" writing, which historians compiled pure

---

\* Ph.D.,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The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Centr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istorical events without their personal comment and arbitration. The “chronicle” form reveals a major similarity between the two publications.

But purpose of the chronicle writing creates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written records.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Taiwan interfered deeply with the editing job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at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 tallied with their political expectation. The chronicle of Yamaguchi Prefecture, otherwise, aimed at encouraging prefecture residents’ love and recognition to hometown. The goals therefore made the two historical writings different in terms of focus and writing angle.

Keywords : Local chronicle, Local history, The history of Taichung City, The history of Yamaguchi Prefecture.